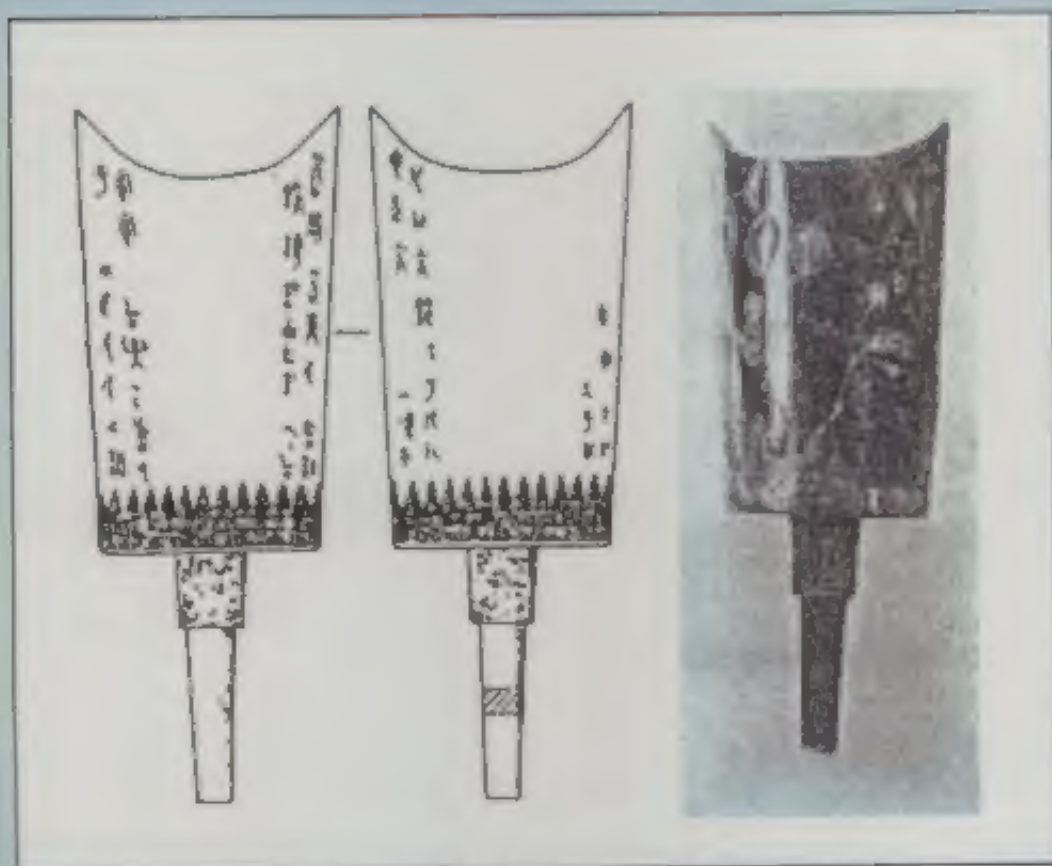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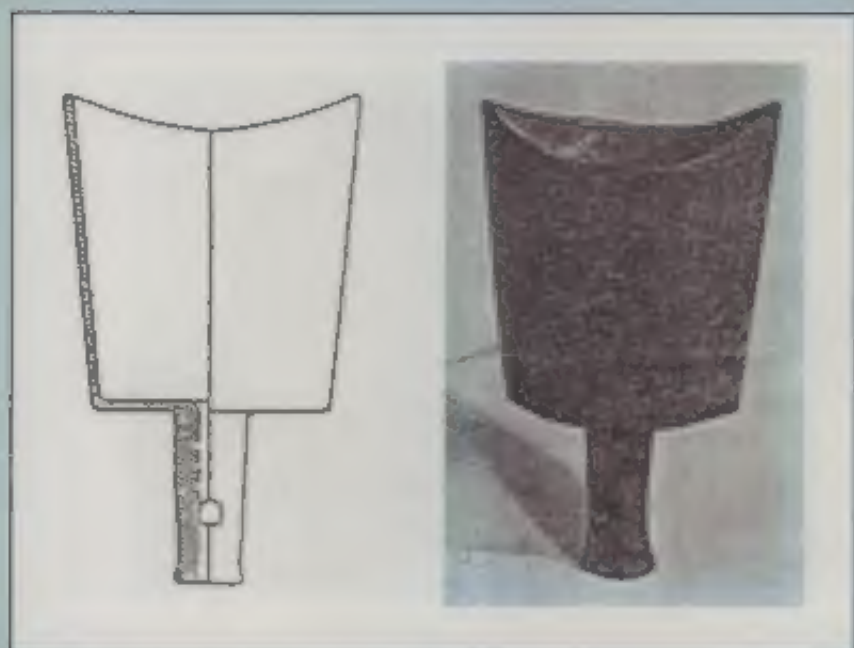




◀ 圖一 戰國銅鼓其南音拓本（編鐘樂器部分）



▲ 圖二 浙江紹興柯嶺山出土春秋勾陳（銘文部分）



▲圖三 安徽壽縣古城子出土春秋無銘鐘



▲圖四 河南長城苑商墓出土黃銅鐘

如此，甚至於是鐘口向下，在柄上還帶著中國式的環耳，顯然是懸掛著打擊。

由上述各節，則知「鉦」、「鈦」、「鐃」三者是同屬一種樂器——我常廣義稱它們是「鐘樂器」。《說文解字詁林》引「漢雜事」：「發以動眾，鉦以止眾，夜鼙鳴，鼓鳴則起；齊鼙鳴，鉦鳴則息。」《周禮》卷十二〈地官〉：「鼓人：以金鑄鉦鼓。」鄭氏注：「鉦，鉦也，形如小鐘，軍行鳴之，以爲鼓節。司馬職曰軍行鳴鉦。」賈氏疏：「此謂在行軍時所用，始鼓與鼓爲節也。」可見鉦是作戰的軍樂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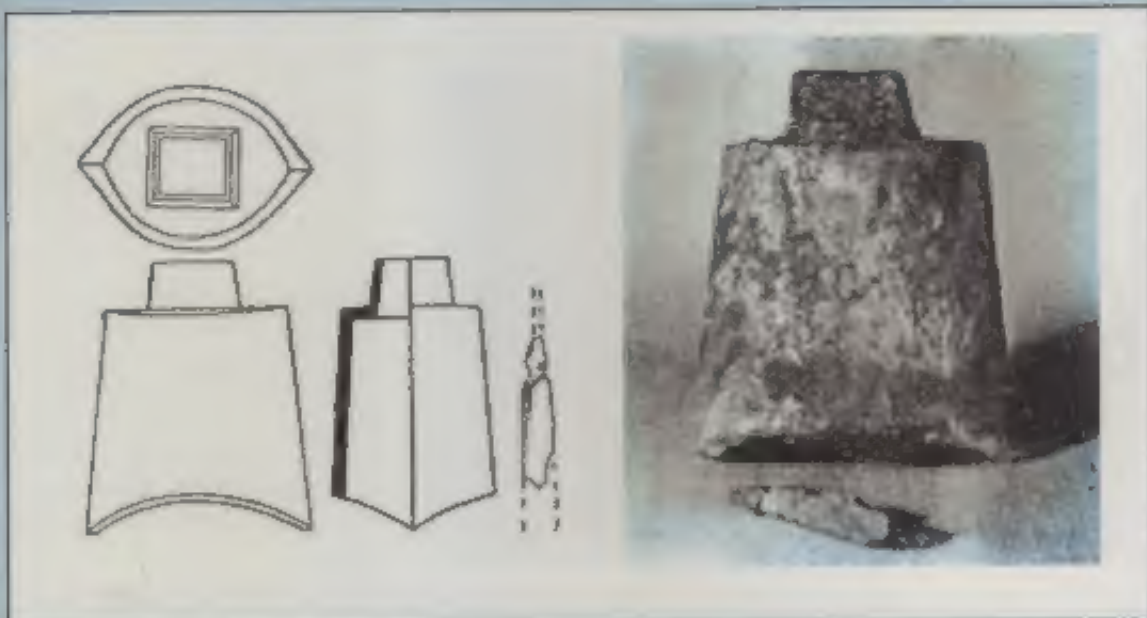
現在出土時代最早，最稱奇的鉦，是安徽省壽縣古城子出土的「無銘黃鉦」（圖三），在鉦的鼓部有三十二字的銘文，是於國諸侯受高君賞賜之物，時代是春秋間，請參見本稿第二～（三）節「鈐」所敘述（一說鉦盛行於春秋時期，楚等南方各國，鉦不但是軍地樂器，也用於祭祀，宴賓；還富有開世意義在內，如「無銘黃鉦銘」有「其萬年，用享，用孝，用祈眉壽，子子孫孫永寶用之。」（〈安徽壽縣出土兩件銅樂器〉，初見《文物》，一九六四年，文物，七期，三〇～三一頁，及郭著《管子昇，無者黃鉦及其他》等文）。

漢代的鉦，除我國疆域外，見於一九八〇年河南省與城縣范湖盛莊發現的新莽時代的銅鉦（圖四），通高四〇公分，口寬三一分，額寬二六公分，柄長二四公分，重一一・三五公斤，呈兩鐘形，素面無紋飾，柄上有等距離兩道弦紋，柄背面兩鈴之間有一個半環形耳，鉦身正面居中有漢隸銘文：

鉦司縣司者發督今正，重三十三斤，始建國天鳳三年造。

《漢書》〈地理志〉：「王莽改





▲圖五 廣州市南海區九號漢墓出土銅鐃

造制置縣為鬱州縣，即今河南省禹縣。據《左傳》等書：「司馬發時有正」，為王官執府發時部族的長官。鈃中所藏刻重量與漢制大致相符，但僅十二公克而已。按漢代度量衡標準，每一斤約相當於二五八・二四公克，四十四兩斤為十一公斤三六三・四四公克。

正尊「始建武」即西元九——三年「天鳳四年」即西元十七年，時正值綠林、赤眉兵起，後漢光武帝劉秀，攻下順川（馬縣）、昆陽（葉縣）、鄧（鄧城）、宛（馬陽），莽軍四十餘萬遂覆沒。此器出土地點臨澧村，是春秋時楚靈王遷葬之地，而在臨澧古戰場範圍內，此銅鐃為當時莽軍在此陷城前後遺物（《襄城縣出土新莽天鳳四年銅鐃》，姚學撰，一九八一年《中原文物》二期・六一面）。《漢書》卷六五〈東方朔傳〉：「臣向少失父母，長養兄嫂，年十三學書，三冬文史足用。十五學擊劍，十六學詩書，讀二十二萬言。十九

學孫吳兵法，戰陣之具，及鼓之節，亦讀二十二萬言。」顏師古注：「鈃鼓，所以為通戰士軍之節也。証奇正。」

## （二）鐃

鐃 古代銅製擊奏樂器或響器，其形制略近於甬鐃，但比甬小，鈴大，通短而方，可懸以木柄，體腔內留舌，搖之發音，舌分木較與金屬製兩種，前者稱「木鐃」，後者稱「金鐃」。

《周禮》卷十二〈地官〉：「鼓人，以金鐃通鼓。」鄭氏注：「鐃，大鈴也，振之以通鼓。司馬遷曰：「司馬遷鐃。」賈武疏：「以金鐃通鼓。鐃曰：此是金鈴金舌。故曰金鐃。在軍所振，鈃金鈴木舌者為木鐃。臨令時州縣、言通鼓者，兩司馬振鐃。軍將以下兩擊鼓，故曰通鼓也。」漢劉向《釋名》〈釋樂〉：「鐃」不載入樂器類；在〈釋兵〉類有「鐃，度也，號令之限度也

。」許慎等《說文解字詁林》：「鐃大鈴也，軍法：五人為伍，五伍為兩，兩司馬執鐃。」「古者將有新令，必當木鐃以號眾，使明聽也。木鐃木舌也，文事當木鐃，武事當金鐃。柷、鼗、鈴、鈃、鐃、鐃五者，形制皆同，唯鈴、鐃有舌為異耳。」（龍文書局本）

《漢書》卷二十四上〈食貨志〉：「孟春之月，群臣皆散，行人振木鐃徇於路，以采詩，獻之太師，比其音律，以聞天子，故曰王者不壞牆戶而知天下。」這是漢代祖思有以重振的先朝文教宣傳方式，所以認為「此先于制土處民富而教之大略也。」「然後，至德流洽，禮樂成焉。」

漢代的銅鐃出土文物有兩處：一九七三年廣州市南海區約有西漢墓葬四十餘座，其中九號墓出土「銅鐃」一件（圖五），通高七八公分，方甬中空，口呈月牙形，素面無紋飾。出土銅鐃分有長四公分已殘斷骨棒一根，可能是「木舌」，



▲圖六 河北定縣北莊漢墓出土銅鐃



▲圖七 虎紐鐃子

表示這件鐃是木鐃，以全圖中圈數（《廣州何金坑的西漢墓》，一九七四年，廣州市文物管理處編，考古學報，一期，一四五～一七二面）。


一九五九年河北省定縣北莊發掘漢代古墓一座，出土「銅鐃」一件（圖六），器身扁圓，上置一圓柱形柄，柄中腰有帶狀凸弦紋一週。鐃的底部有紋，兩面相同，定縣在漢代是「中山國」，從對郡國的年款，推斷這是後漢中山簡王劉祐的墓。劉祐是光武帝劉秀的皇后少子，受到特別恩寵，貴太后臨朝時期，他與貴戚兄弟友善，永元二年薨（西元九〇年），贈錢一億，所以「大為修冢茔，開神道，平夷吏人家冢墓以千數（剽平他人墳墓），作者萬餘人（工人）」（後漢書卷四二光武十王列傳）。現在，看到這墓不具大規模，為何史書記載竟是如此誇大其辭？還說「制度益闕莫及。」（《河北定縣北莊漢墓

發掘報告》，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撰，一九六四年，考古學報，二期，一二七～一九四面）。

鐃是相當重要而罕見的音樂文物，必須具有領導身分的人物，才夠資格使用。這座出土銅鐃的漢墓，其墓主的身分是如此的。漢劉安《淮南子》〈說林訓〉：「心所悅，雖身爲快（肥）；心所惡，雖身爲蹙。」這是比喻漢代人，只求遂其心欲，而不計其利害得失，正是歌人諺語：「嘯呼嗚呼（口哨）」——各有所爲（愛也），表示同樣的一種響器，非尋常條件下交換了：豈不正是漢人「毀鐘爲鐃」的心理變態嗎？

### （三）鐃子

鐃子（圖七）古代銅製擊奏樂鳴樂器或響器，也稱「金鈸」、「摩子」、「和」。形式大小如銅鑊狀，其縱斷面呈橢圓形，平頂，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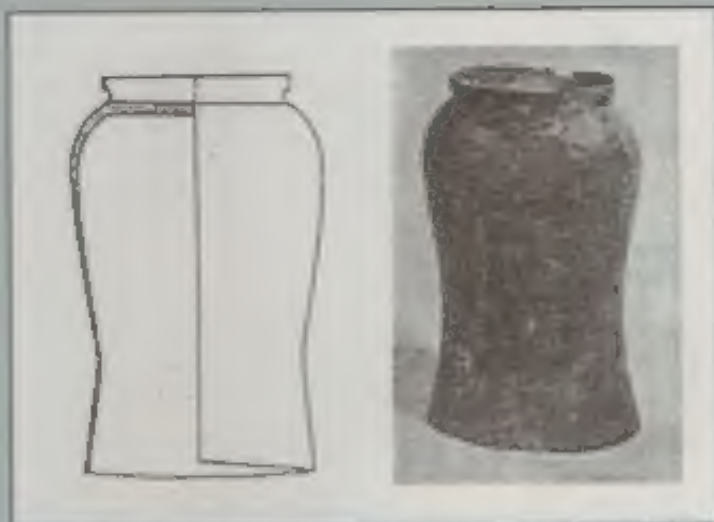
首像是捲過的盤子，盤內有的有紋飾，還有紐；紐有「槓形」（)的，作用是穿繩子吊起來擊奏；或是立體虎形的紐，前部隆起，前下內收至足底，或足部向外撇。側面有圓隆，足底也有簡單紋飾，內壁較薄，用青銅材質鑄造合范鑄成。

《周禮》卷十二〈小司徒〉：「聶人，以金鈸和鼓。」鄭氏注：「鐃，鈸子也，即如銅鈸，大上小下，與鼓相和。」同書卷二十三〈大司馬〉：「小師，掌八聲聲音之節，與其相。」鄭氏注：「和，鈸子。」賈氏疏：「注：和，鈸子，釋曰：鄭知「和」是鈸子者，見岐人云，金鈸和鼓，故知「和」是鈸子。」《周禮》本名《周官》是西周記述政府各級機關組織，官吏編制及職位類型與辦公權利的書，它的合編朝代，應該是西元前十一世紀，由此可見漢代三種青銅擊奏樂器是，鐃、鐃子，都是相當古老的傳統樂器；可是鐃子不知何故被湮沒失





▲圖八 安徽壽縣石碭子出土春秋鉦子



▲圖九 安徽壽縣石碭子出土漢鉦子

博？在賈誼《賈公彥疏》中，曾引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：「鉦于也者。鉦于之名出於部之太子樂官。『太子樂』是東漢明帝永平三年（西元六二年）詔興禮樂定為四品，其中之一『太子樂』——典部職上陳諸食樂。從這裡看，漢代的人並不知道鉦子，六朝時代也絕無此器流傳，但在南齊時四川廣漢什邡百姓，發現一件，稱為『古禮器』或『以爲神物奉祀之。』（見南齊書後註）到了宋朝非常多了。《宣和博古圖》中便載有十八件周代鉦子圖及說明。

我們現在知道周代最早的鉦子，是一九六二年在安徽壽縣與「無諸命鈺」同時出土的春秋時代鉦子，它的形式與後世略異，通高三公分，腹扁圓形、腰細，首為鑿足式（即鑿形），無鈕，兩側有方形穿孔供繫繩，鈺器製作較為粗鬆（圖八）（請參考二——節「無諸命鈺」）。又，一九五五年安徽壽縣修復西門，發現戰國楚墓，在銅器上有「蔡侯」兩字，《史記》〈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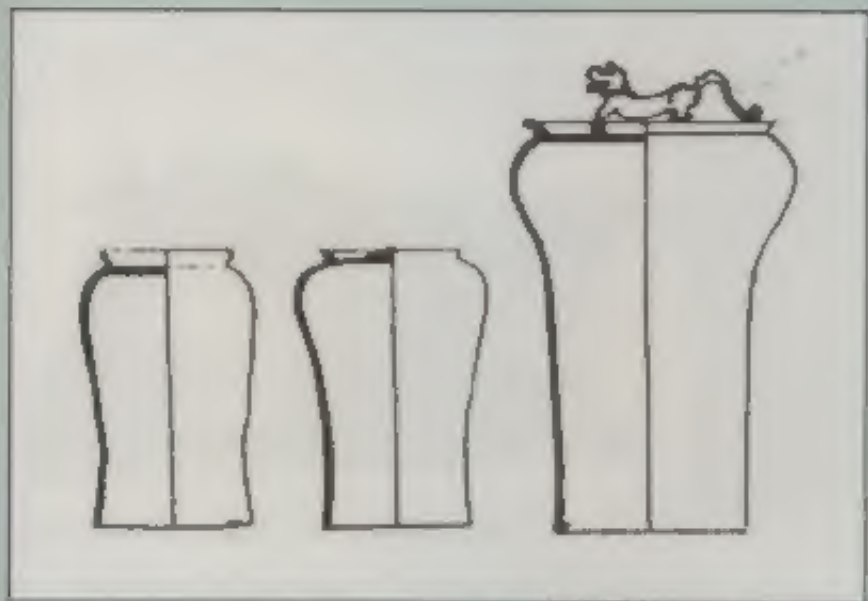
世家〉載，蔡威侯名剛，卒年當在西元前四五七年，出土成與的禮器，成組的樂器，大批的車馬器，製作精美，紋飾複雜，學術界稱此墓為「蔡侯墓」。出土器物為「祭器」，此器解決了一些古器物的名稱考辨問題，及多個斷代的依據。蔡侯墓出土鉦子（圖九）一件，戰國形，素面，無鈕，通高四公分，已殘缺，它與上述鉦子都屬於早期文物（《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》，一九五六年，科學出版社本）。

鉦子在周代用於典禮及軍事，軍樂方面，春秋之世，楚王夫差黃池之會，秦穆公就鳴鑼鼓丁寧、鉦十，楊鐸（國語吳語），所以鉦子常常與編鐘同時出土，既選套置在鉦子內，既節省空間，也避免被擠壓破壞。

現代鉦子出土地點，遍及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貴州、雲南、陝西、安徽、江西、廣東、廣西十個省份，又以長江中上游湘、鄂、川、黔交界地區最集中，湖南出土最多達三十餘件，這些鉦子年代，從春

秋以迄經東漢，皆有發現，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：（一）無鈕，足外撇型；（二）小型扁鈕，直足；（三）虎形鈕，體形較大（圖十）（〈鉦子述略〉，一九八四年，文物，八期，六九～七二面）。

一九五六年湖南常德縣敬輿音樂文物中，檢獲到銅扁站立執事人像鉦子（圖十一）一件，色澤綠青，光澤異常，鉦鈕已斷佚，首飾盤內鑄有殘痕，在鉦鈕痕上方刻一人，穿長裙，兩手袖中作拱揖狀；此人背後刻魚一條，魚下方有菱形雷紋似水，以表示其靜而。鉦鈕下方與魚人相正對處，刻兩家裝飾，看來像是一雙船，首尾兩人操槳，中間有一堆似是（不易辨認的）文字構圖，象徵吉祥的蓬帆，相當於民間存世時，將「對救生財，出行大吉」聯結於一體的「桎字」，用同時收集到的文物研判，此器年代應在秦漢（〈介紹幾件從敬輿中檢選出來的重要文物〉，一九六〇年，文物，三期，七五～七六面）。



▲圖十 鐃子三種類型剖面圖

1. (型《無紐》)鐃子(安徽宿縣出土)
2. (型《無紐》)鐃子(江西修水出土)
3. (型《虎紐》)鐃子(貴州桐梓出土)



▲圖十一 湖南常德津市東漢陶器廠出土鐃子

鐃子如何演奏？在《南齊書》〈高祖十二王列傳——始興簡王(蕭)懿傳〉、《周書》〈斛斯徵傳〉、及《通典》〈樂典〉等書均涉獵到：如《南齊書》卷三十五〈始興簡王懿傳〉：「高祖(四川省遂寧縣)什邡民陳祖，以鐃子獻焉，古禮器也。高三尺六寸六分，圍二尺四寸，圓如甕，銅色黑如漆，甚薄。上有銅馬，以繩繫馬，令去地尺餘，應之以水，又以蠟燭水於下，以芒屨當心，繞注鐃子，以手振芒，則其聲如雷，清響良久乃絕，古所以節樂也。」這則記事有些文字半懂不懂，因沒辦法觸摸到實物，否則，是可以探究的，《通典》照抄這段文字，《周書》大致如此，宋人洪邁《容齋隨筆》〈古鐃子〉綜合各說，雖較詳細，最後對於「就擊於地，灌水之制」不復考究，「《宮中傳古圖》嘗識其這樣盛水的方法是無知誤；《文獻通考》也因此誤其此論無知。」

鐃子是中原樂器，可是在中原地區卻少見，在西南少數民族中，不但出土，而且雲南省晉寧縣石寨山古墓群，還發現兩件有關鐃子演奏的文物，真實將鐃子當年演奏情形表現出來，可以排除「鄭書偽說」，其歷史價值不待言喻，晉寧縣就是漢代西南夷滇人的政治文化中心，石寨山在城西五公里，是古代滇族酋長人物的墓葬區，現出土古墓二十座，滇王墓也在其中，一併出土許多貴冑白銀文物，非常珍貴，其中有兩件有關鐃子演奏情形文物二件，可供參考。

鐃子演奏樂舞銅牌(圖十二)：雲南省晉寧石寨山十三號墓出土，編號(M13:65)，鑲金，通高九、五公分，寬十三公分，背面有圓扣，正面以兩層建築物為背景，上排四人，作歌舞姿勢，四人頭戴狀如冠，冠後兩條長帶下垂，髮分作兩股垂向耳前，耳上戴大環，雙手向兩個上舉，腕上戴大環，在左耳、左腰帶，腹前掛一個形如銅，下排四人，右起第一人吹直管胡蘆笙(橫吹式)，左側有一大壺形器，曾有人稱「銅鼓」；第二人吹奏短管樂器，第三人左手抱著鐃子，右手五指併攏，正在敲擊，鐃子無紐，想像此器甚薄，否則不能發聲；第四人吹曲管胡蘆笙(直吹式)，此器物為歌舞表演，面向鐃子、銅鼓(?)伴奏，想像生動活潑，是出土青銅器的奇葩，更出於鑲金品，金光閃閃，顯得十分華貴(《雲南省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發掘報告》，雲南省博物館藏，一九五九年，文物出版社，八〇~八一面)。

貯貝器蓋鐃子演奏銅雕(圖十三)：貯貝器蓋(部分)地面上立兩根木椿，上架橫木桿，木桿置於銅鼓與鐃子之耳、紐，擺置在木椿上，一挽頭髻拖長裙的男子，跽坐，左右手各執一槌，右手打銅鼓，





▲圖十二 雲南晉寧石寨山十三號墓出土樂舞銅俑〈子鼓奏〉



▲圖十三 雲南晉寧石寨山十二號墓出土野具銅器〈子鼓奏〉

左手敲鐃子，這是整個樂隊的樂隊的部分（後詳）。這種寫實作態的鐃子演奏情形，與我們想像應當是一致的。何以《南齊書》記載摩竭令人難解？現將作許多鐃子它的打擊區是在頸部，也與此銅像的顯示相合。

以上兩種鐃子，在西南古代少數民族中流行情形，可惜石寨山出土大鼓銅像，卻沒有一件鐃子，我們尚可試目以估之（《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發掘報告》七五～七六面，及《萬縣考古論文集》，萬縣縣署，一九八五年文物出版社，一四七面）。

薛羅士琳《晉義熙銅鼓考》（丁氏日知錄影印本）云：「泗城府屬人，每歲正月詣府縣行獻歲禮，擊銅鼓，鐃子，一唱百和。」可見銅鼓與鐃子是合理的編制樂器。「義熙」是晉朝末年的年號，屬早期的銅鼓，鐃子鼓著錄的文獻。羅士琳是清代數學家，

#### (四) 缶

缶 古代土製的擊奏體鳴樂器



▲圖十四 宋·陳旉《樂書》「缶缶」，攝影





▲圖十五 宋·馬和之畫《毛詩》雅堂圖（擊缶部分）

，係先民用來盛水或食物的盆子，相傳是四千多年前黃天氏發明的。先秦時代各種音樂的書籍，如《周禮》等就沒有著錄這種樂器。《國語》〈釋樂〉也未著錄，在〈釋器〉中有著錄，說它並非樂器，在無鐘鼓時，才用它代替而已。後漢應劭《風俗通義》卷六〈角〉：「諸侯稱：『日昃之類，不鼓缶而歌。』」詩云：「坎其擊缶，宛丘之道。」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，秦人鼓之以應歌。」《樂府》《樂書》卷一一五〈古缶〉（圖十四）：「土音，缶立秋之祥也。古者燕饗之缶，則缶之為器，中虛而音實，外圓而音應，中聲之所出者也。」缶不算中原文化正統的雅樂器，如莊子〈至樂篇〉：「方其翫鼓盆而歌」，就是擊缶。圖「缶」如此，齊景公飲酒，去冠披蓑而「鼓盆」，表示不重禮度。古代西域以缶為樂，唐西域也以擊缶為樂，故稱缶為「胡缶」。

原始時代的食器「缶」，平常是專用於食飲，然而會乘興打擊它作樂，本來此物是食器，卻在這娛樂的一瞬間，變為樂器；如此食器

與樂器同為一物，可是人們平常不認它是樂器，只能在娛樂時才視為樂器。今天在中亞細亞地方，用土製的缶為食器，往往又打擊它為樂與歌甚作伴，而當地也不視缶為樂器。戰國時代，秦趙渾池之會，秦王曾打擊缶於趙王前而歌，秦王恐是信實時西域習俗，不認為是食器而是樂器；趙王擊缶於秦王前而歌，而趙王不認為是樂器而是食器。在《史記》〈廉相如傳〉記述，便彼此認知不同。正如「缶」在上古時代，是用於狩獵或戰爭的，如彈撥其弦，可以發聲音，故往往彈弓弦以為娛樂，而人不稱為樂器。還有些未開化的民族，打擊自己銅盆或陶盆而歌，而其打擊發音之際，也不視為樂器。

人類在石器時代，距今似在十萬年前，並不認為有特別的樂器存在。自舊石器時代經過磨石時代，進入新石器時代，約在一萬年前，至少有可稱為樂器的出現，在今天被認為樂器，多是新石器時代以後的物件。新石器時代以前，即中石器時代，為樂器曙光期，只以動物骨為笛，既是狩獵用的信號或誘捕器

，而吹之又可以娛樂歌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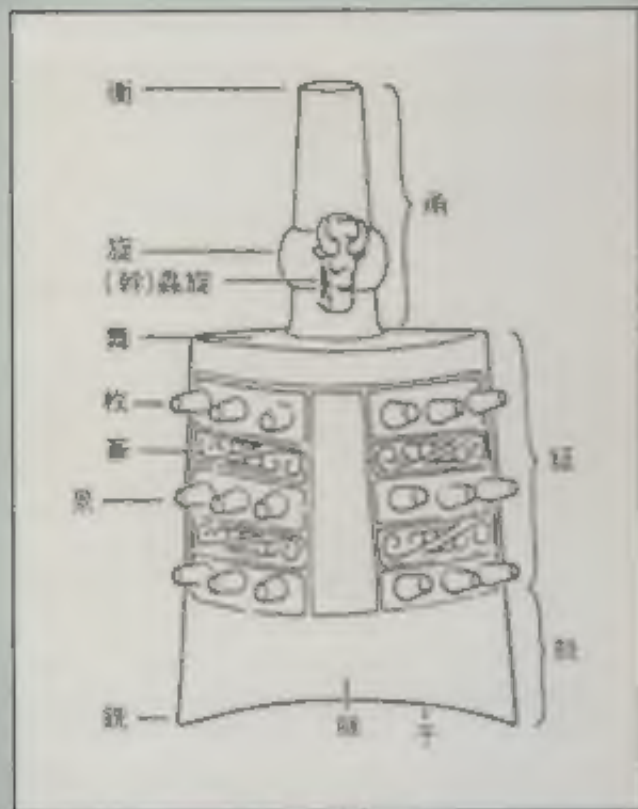
新石器時代樂器，快速發展，中國已磨石為磬，以土作埙為埙，以懸麻葛結繩為琴瑟之弦，許多重要樂器，都是在此時期定型發展（以上取自《中國音樂史》，田邊尚雄撰，台灣商務印書館，三九—四〇面，第二章〈中亞音樂之脈散〉）。

關於缶的文獻，最早見於《詩經·陳風》〈宛丘〉：「坎其擊缶，宛丘之道；無冬無夏，值其鷺雉。」大意是指擊缶發出「坎」的聲音，在陳都城宛丘道東，即今之河南省淮陽縣，不分寒暑習樂——好巫祝請新鬼神歌舞，伏着飾有鷺雉的指屨起舞。此詩是朝遊而之詩，宋徽宗馬和之繪《毛詩宛丘》圖，歌者四人，舞者四人執鷺雉，其中一樂師正在擊缶，地點就是「宛丘」（圖十五）。現代研究中國戲曲史的人，常稱「宛丘」是中國最早的戲園。

清儒郝懿行《國朝義疏》對於舊說：「丘上有丘為宛丘，其中間窪處，復起小部，是謂丘上之丘。」不表贊同，以為「中央下曰宛丘。」宋馬和之畫意確是如此。

近數十年中國大跡未見缶出土的記錄，可能因為它不具樂器的特徵，被視為陶土之類物品；可是漢代關於缶的史事相當多，可見它是一種流行的民間的樂器：

一、《史記》卷八十一〈廉相如列傳〉：「趙孝文王與秦（昭）王會渾池。秦王飲酒酣，曰：『寡人竊聞趙王好音，請奏瑟。』趙王鼓瑟。秦御史前書曰：『某年月日，秦王與趙王會飲，令趙王鼓瑟。』」簡如如前曰：「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樂，請奏瑟以相娛樂。」秦王怒不許，於是相如前進說，因跪請秦王。」……於是秦王不辭，為一擊



▲圖十八 兩神廟（各那的龍門名廟）



▲圖十七 四川涪陵小田溪戰國墓出土簡牘特種（紀國系刻）

年八月，魯王為胡王擊賊，封

二、同上書卷八十七《李斯列傳》：「夫擊甕、叩鼓、彈琴、操劍，而歌呼嗚鳴快耳目者，真秦之聲也。」此處的「秦聲」並傳到近代不替。

三、《漢書》卷六十六之《楊惲傳》：「楊惲，字伯奇，會稽山陰人也。家本秦也。徙居華亭。惲，女也，性喜鼓琴。惲將歌者數人，酒後耳熱，仰天拊缶，而呼烏鵲。其神曰：『田彼南山，甚適不洽。饌一項豆，薄而為具。人生行樂，須富貴何時？』」楊惲的母親是史學家司馬遷的女兒，「田彼南山，……」歌，經師古注：「是關中舊有此曲也。」司馬遷謂「秦聲」似指此。

•

明·《康海子》卷七《精神訓》：「今夫靈敏之社也，下而駘駘，細而而微，自以爲靈矣。靈既爲之學建微，據臣雖，乃性（不祥忌之說）仍用。知靈靈微之足處也。」所著卷十《說林訓》：「君子有過，小人說之，雖不見好，亦不見醜。」指漢代社會一般人見小不知大者的荒謬陋習現象。

五、如寬《讀史記》：「詩者民  
心之會，多以言為事，故其  
已。」

六、國語亦尤〈平樂觀賦〉：「道城地險翠華鼓。」（《藝文類聚》卷六三輯本）

### 三、漢代西南夷樂器

漢代所說的「西南夷」，根據《漢書》卷九十五〈西南夷兩粵朝鮮傳〉記述漢代西南少數民族所屬的分佈及形勢為：

①西南是君長以十數，復郎最大（今貴州省綏寧縣）。其西，靡莫之屬以十數，滇最大（今雲南省昆明縣）。自滇以北，君長以十數，邛都最大（四川省西昌縣）。此皆犍牁，耕田，有邑聚。②其外，西至牂牁以來，北至葉榆，名爲夷（今四川省西昌縣）。昆明（今雲南省大理縣），臨邛，越嶲移徙，亡常處，亡君長。地方可數千里。③自馬以東北，君長以十數。徙（今四川省天全縣）、笮都（今四川省清江





▲圖十八 雲南晉寧石寨山六號墓出土圓形紋銅鐘

鐘」最大，自仲夏至秋，群衆以千數，再戰最大（今四明有茂林）。其俗，或土著或移民，在蜀之西，自蜀以來，群衆以千數，白馬（氏族名）最大，皆以然也。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。

以上所述：「第一種是越族——獬豸——從黔江流域到金沙江流域，文明程度最高。第二種大約也是氏羌一類，在瀾滄江流域，文明程度極低，第三種是氏族，在岷江大渡河流域，和嘉陵江上游。」（《白話本國史》，呂思勉撰，二四四頁）概括言之：漢代西南夷地區，是今天雲南省，四川南境，貴州西南境，這些地域的風土人情，已與中原傳統文化有別，表現在音樂方面，也各具特殊情結。幸好有許多寶貴的音乐銅器，及銅紋圖騰出土，為歷史作了見證。

### （一）西南夷銅鐘

西南夷銅鐘，是西南夷地區出

土漢代的一種「鐘」形樂器。它與中原文化的「鐘」有極大的差別，本稿特列舉一件「滇鐘」（圖十六）及一幅「銅鐘」（圖十七）作比較，在通鐘上有各部位的專門名辭，是鐘樂器辨識的基礎。

西南夷出土的「鐘」，基本上是繼「銅鐘」式的，但它不能還稱爲「銅鐘」。爲了區別這種鐘的名稱，擬暫擬一件漢代「滇鐘」的銅文來稱謂它：如「那件最『銅鐘』——只直徑六千五百卅」，故暫定名爲「西南夷銅鐘」，既概括地域也直指鐘形，想必也較爲合理。

西南夷出土的銅鐘，以六件、三件爲一組，也有一、二件單獨體的。鐘的橫剖面，呈扁形、菱形，在聲學理論上，它是屬於「合瓦式」的，像似兩片呈瓦由兩端合范青銅鑄成。其外展微前，兩端內收，唇口齊平（圖部有三角形組，半環形組，少數鐘上有紋飾。鐘表面紋飾樣式多變化，富於地方性色彩，及濃厚社會意識形態，與中原樂器

的姿美觀。這些成對的鐘，含有六聲音階或七聲音階因素，又因爲「合瓦式」非正圓形的鐘體啊，它兩端視角形成左右兩條斜，鐘口斷面呈兩頭尖的薄片形，這種特殊結構，造成鐘體的振動限制，敲擊鐘的「鐘」部（亦有稱爲「正鼓部」）與「鼓」部（右鼓）可以發出兩個不同的音韻，這兩個音韻的正鼓關係應該是「小三度」，可是西南夷的銅鐘，只有少數是經過實測音韻的（《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——樂器篇》，陳萬鼐撰，第二章〈鐘的科技〉四〇～五〇面）。

近四十年來西南夷銅鐘出土情形概要：

一、一九五七年雲南省晉寧縣石寨山古墓群六號墓出土圓形紋銅鐘六件。（圖十八）

銅鐘出土於石寨山古墓群六號墓東端，編號（M6-114-119），最大的鐘通高四〇、三分，最小的鐘通高二九公分，其中兩件完整，



▲圖十九 雲南祥雲大波那銅棺出土蛇形雷紋銅鐘

四件已殘破。鐘體則呈橢圓形，兩端微收，唇口齊平，頂部有環形紐，無紋飾，兩面飾有蛇形的雷形紋，左右對稱，姿態優美，唇口有迴旋紋。這組銅鐘可能以「G」為調首。此墓出土文物，為各墓之冠。從出土金印研究，知為滇王之墓；此鐘在《雲南省博物館》書中，題「滇王銅鐘」，反映了滇王輝儀中，對於中於傳統禮樂制度的尊敬與重視（《雲南省博物館書山古墓群發掘報告》，八〇～八一面）。

二、一九八四年雲南省祥雲縣大波那木柩銅棺墓出土蛇形雷紋銅鐘一件。（圖十九）

銅鐘通高四八公分，唇口寬二六·七公分。鐘體橫斷面呈橢圓，兩端微收，唇口齊平，頂部有半環狀人字環形紐，鐘面由許多蛇形圖案組成，實以細線刻地，口緣飾卷雲紋。此墓可能屬於漢代「昆明族」，則當時曾奉「滇族」，在文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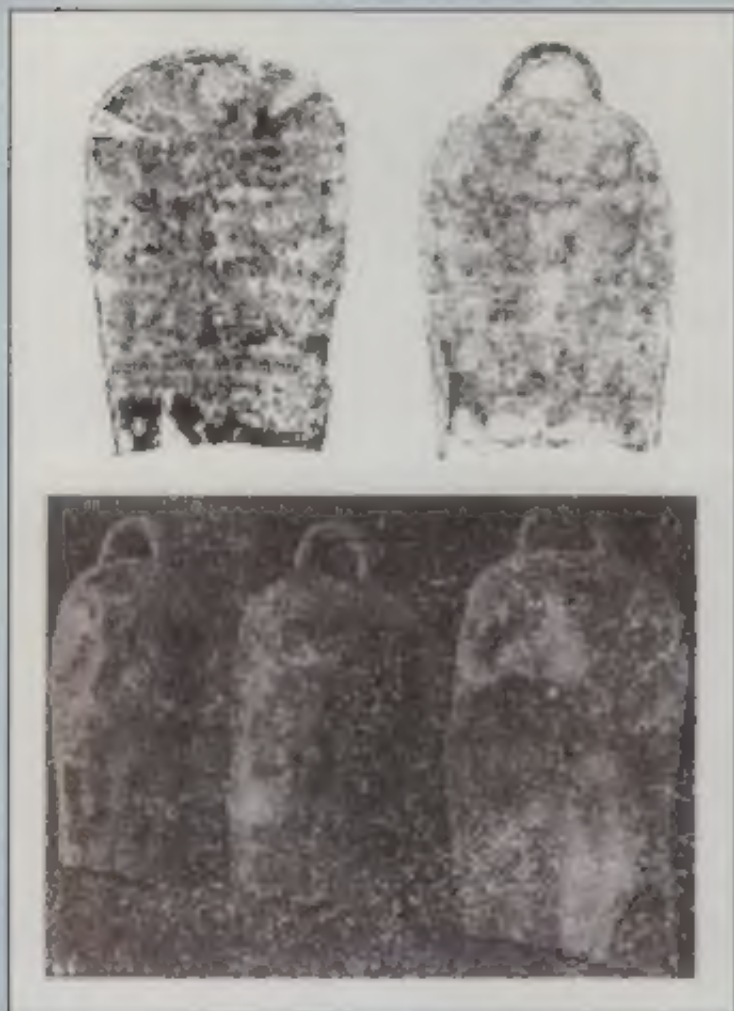


▲圖二十 雲南祥雲柩村石柩墓出土虎豹形紋銅鐘





▲圖二一 貴州羊定福土龍村出土鐘蛇紋銅鐘



▲圖二二 四川會理安遠轉場出土長蟲紋銅鐘

上有一定的聯繫；因這種蛇形紋與石寨山古墓許多出土器物，以蛇形為裝飾的作風是相同的。（《雲南祥雲大波那銅棺墓清理報告》，一九八四年，考古，十二期，六〇七—六一四面）。

三、一九七〇年雲南省祥雲縣楊村石棺墓出土虎蛇形紋銅鐘三件。（圖二十）

銅鐘通高三〇．二公分，唇口直徑一二．四公分，鉤高六．四公分。鐘體橫斷面呈扁圓形，兩端微收，中部稍鼓，唇口齊平，頂部作三角形鈕。鐘面一面飾兩虎相鬥，另一面飾兩蛇相爭，口緣飾兩道銅蛇紋，中間卷雲紋，圖案極為細緻，顯示滇池文化與滇西文化之關係。此墓下限年代為西漢早期（《雲南祥雲楊村石棺墓》，一九八三年，文物，五期，六六—六九面）。

四、一九七八年雲南省羊定縣福土龍村出土鐘蛇紋銅鐘六件。（圖二一）

銅鐘最大通高五三公分，最小通高四三公分，是雲南出土銅鐘最大的一套。鐘體橫斷面呈扁圓形，唇口齊平，頂上有半環形鈕，由兩道合范鑄成。鐘體紋飾，較大的兩件相同，兩面均飾蛇紋，其餘皆一面飾蛇紋，另一面飾雲紋。此鐘出土於山坡上。其形制與大波那、石寨山等墓出土銅鐘一致，時代似較石寨山稍早，石寨山龍形紋比此鐘蛇紋紋進步甚多（《雲南羊定出土六套銅鐘》，楊堉撰，一九八二年，文物，五期，八四頁）。

五、一九七七年四川省會理縣安遠轉場出土長蟲紋銅鐘六件。（圖二二）

銅鐘最大通高四九．五公分，最小通高四三公分。鐘體橫斷面呈菱形，口徑作弧形，環形鐘紐無紋飾，與鐘體厚緣形成。鐘體每面均



▲圖二三 湖南祁陽縣石門洞岩畫鼓圖殘片

器有兩條左右對稱的紋飾帶，從上至下規整排列如雷如雨，如雲如蛇（即「蛇」），紋帶的兩部，由三角齒紋、圓齒紋、同心圓齒紋、點狀紋等基本紋飾變化組成。這種紋飾與會理縣羅沖出土的漆鼓鼓面紋飾原則相同，可以判斷這兩者為同一時代的器物，其年代為西漢時期。

這件銅鼓雖在四川發現出土，隔著崇峻花市（新都都市名）就是雲南省界，所以鼓的造型與四川西昌大石墓出土的銅鼓相似，也與雲南石寨山六號墓出土銅鼓相似，表現了漢代西南夷民族文化間的密切關係（《四川會理出土一組銅鼓》，《陶匱雜誌》，一九八二年，考古，二期，二一六～二一七面）。

六、一九五八年湖南省郴州縣從岩洞品中挖出畫像鼓二件。

「畫像鼓」是以東漢「畫像石」技法，在鼓面作畫像，這畫像屬「陰線雕」。此鼓在何處挖出，同時還有何重要文物出土？尺寸大小均未見著錄。原文作：「小面鼓，上有四鼓鼓七鼓，獸身萬足，鼓面兩面均繪紋飾：甲器的頂部刻鑿鯢魚，鼓面有隸書銘文「主師作卜半，立子孫」八字，一面刻一人佩刀張弓，作獵鳥狀，或足作六方形，每方刻有各樣鳥獸，作飛躍奔逐狀，一人佩刀張弓射矢，在後面追逐；一面刻有「鄧次嚴調羅一只，直錢六千五百世」銘文，鼓底有陽文「主人相宜」四字。乙器的形制與甲器相同，惟花紋較複雜，一面刻圓型，下坐一人，口中銜矢，以足張弩（圖二二）；一面刻古樹一枝，上攀一馬，馬前置幣，樹枝上立一鷹隼；鼓口有「高貴昌樂永

史，李是。」八字陽文。」此器為東漢時代（《在祁陽縣石門洞中檢出來的重要文物》，一九六〇年，文物，三期，七五～七六面）。

此鼓無圖版，僅乙器拓片一張，應列入西南夷銅鼓有待考證。鼓面所謂「圓型」應為漢代門欄性的「圓」，常見於漢墓後石中，稱為「藻圓」，漢代將圓對立建基於城門、宮殿、祠堂、陵墓前，象徵大門，又「口中銜矢，以足張弩。」也是漢代常見畫像，這種姿勢稱為「張弩」。《漢書》卷四十二《申屠嘉傳》：「申屠嘉梁人也，以材官擊張，從高祖擊項羽，遷為隊率，從擊豎布為都尉。……（文帝時）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。」如淳注：「材官之多力，能習射擊張弩之，故曰張弩。律有『張弩士』。」<sup>16</sup>